



贺兰集

邱树森 著

7
6
2

邱树森 著

贺兰集

江苏古籍出版社



C

691659

BA33/10

贺 兰 集

著 者:邱树森
特约编辑:邱 禹

出版发行:江苏古籍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照排印刷:南京电力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25 插页 1
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433 千字 印数:1—500 册

ISBN 7-80519-927-2/K·429
定 价:34.5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0

序

20 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王国维先生、陈垣先生是中国元史研究的开创者。继起的是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诸先生。元史研究的第三代,也就是建国以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大都出于三位先生门下。邱树森先生便是第三代学者中杰出的一位。

树森先生早年负笈南京大学,受业于韩儒林先生。后来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同时潜心于元史、民族史的研究,成绩斐然。他是《元朝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这部由韩儒林先生主编的著作,很好地总结了中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获得了普遍的好评。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部分和《中国历史大词典·辽夏金元》卷的重要组织者和撰稿人,对这两项有深远影响的工作贡献殊多。除了积极参与集体工作之外,他还就元史、民族史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和专著,收集在这本文集中的,便是这些论文中有代表性的部分。

这些论文以元史为主,涉及元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农民战争等许多方面,此外还有一些民族史、历史地理方面的作品。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功力深厚,视野广阔,既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时代和民族的特点,又长于作具体问题的考订论证。资料的丰富,逻辑的严密,文字的清晰,分析的精当,都足以令人钦佩,特别是关于元末农民战争和回族历史的研究,时有创见,在学术界有很好的影响。

树森先生不仅治学勤奋,卓有建树,而且长于学术组织工作,两者兼备,这是很难得的。他乐于助人,奖掖后进,更为朋辈所称誉。我与树森先生相识 20 年,获益甚多。对于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深感高兴,相信此书对于元史、民族史的研究,必将是有力的推动,同时也期待着作者有更多的新作品问世,为学术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高华

1997 年 3 月于北京

序

我和树森兄同受业于韩儒林鸿庵先生,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一起学习、工作近三十年。六十年代初,鸿庵师接受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任务,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史卷和一部元朝史。根据任务需要,同时出于培养人才的考虑,他拟定了大纲细目,让我们几个年青人分头编撰初稿,从史料的搜集、考订到前人成果的借鉴等方面都作了具体指导,提出严格要求。鸿庵师素来主张需有足够的专题研究基础才能从事综合性著作的编撰,而我们当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因而他一再以此训诲,意在要我们按专题研究标准对待每章每节的编写,把基础补扎实。那时我们研究室设在校图书馆内,承李小缘馆长热心支持,把馆藏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图籍以及有关的中外文期刊集中到本室,提供了极大便利,又幸无期限之迫,得以潜心研读,细细琢磨。

树森兄分工参撰元后期史和文化、经济部分,遂把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这几个方面,不久就拿出有份量的专题研究成果,其勤奋和敏捷,令师友无不为之赞叹。元后期史的中心课题是元末农民起义,树森兄在这方面用力尤多,成果丰硕。从本集所收这一组的七篇代表作可以看出,他的考论论文大多着重于辨析史籍中的抵牾疑误之外,考明记载疏略模糊的史实,所订误发覆者不一而足,其史料挖掘的广度、深度和考订的精确,多能超越前人。他并善于在缜密的细部研究基础上进行归纳以通观全局,对元末农民起义的性质、特点和历史作用等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论析,本集中关于

红巾军政权建设一文即是范例。这种由精细考证达于融会贯通，史论结合的治史方法，也贯穿在他对思想文化史、经济史、民族史等方面的研究之中。如他关于邓牧、王祜、朱思本、刘基及其著作的四篇专论，对诸人的生平事迹、时代背景和交往关系等都作了详尽的考述，在此基础上论析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成就，自能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调主西北第二民院历史系系政后，柯森兄的研究重点转到西北民族史、特别是回族史方面。对具有深厚元史功底的他来说，这本是驾轻就熟，但在担负繁重的行政和社会工作情况下，短短五年中就完成了《中国回族史》等四部大型著作，发表一系列专题论文，不能不令人敬佩于他极强的学术研究能力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他的这些论著无疑对我国回族史研究有很大推动的作用。

我和柯森兄在元史室长期共事的日子里，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工作上，受惠于他之处甚多，这里只想提两件主要的事。其一，鸿庵师逝世时，《元朝史》书稿虽已基本完成，但还需要参照各方专家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补充；书成于众手，交付出版前需要再进行一次集中互审通稿。柯森兄不仅分担了很大部分修订、通稿工作，对全书的整理定稿也发挥了最重要作用。其二，元史室在鸿庵师逝世后所以能继续有所发展，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继续进行，《集刊》的编辑出版得以维持不断，主要应归功于他对我的全力支持和在业务上、组织工作上的具体帮助。至于中国元史研究会，从1980年的成立大会到后来的历届年会和1986年在南京召开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具体组织工作主要是由他承担，其组织能力和奉献精神，在元史研究会同人中更是有口皆碑。

树森兄论文集的出版,是元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必将进一步推动元史和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与学术水平的提高。承命作序,以我之浅学,岂敢于树森兄的大作多所论列,不过很高兴能借此机会略叙同窗之谊,并表达对他学术成就的钦仰之意,祝愿他取得更大丰收。

陈得芝

1997年4月于南京

自序

1959年夏我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系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留校当韩儒林教授的元史研究生。我虽然勉强答应了,但心里总是觉得很为难:元代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人名、地名难记,要求知识面宽、语言条件好,恐怕很难学好。入学后,在韩师指导下开始读书,跟着施一揆、陈得芝、丁国范诸学长做一些研究工作,渐渐产生了兴趣。从此,这一辈子就与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研究工作可分两个阶段:1959-1988年我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学习和工作,主要从事蒙元史研究。1988年至今在银川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和广州暨南大学工作,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三四十年来,写了近百篇不大像样的文章。前年,吾友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张其凡教授、汤开建教授鼓励我编成集子出版,我总感到自己的文章学术水平不高,恐贻笑大方,于是拖了下来。今年吾儿邱禹、邱勉为祝我60岁生日,再次鼓动我出版论文集,于是我不揣简陋,从已发表的论文中选出30余篇,题名《贺兰集》付梓。

回想起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学习、工作的近30年间,好象人生从学步到行走的历程。在当研究生的四年间,韩师工作很忙,又常去外地和苏联、蒙古参加学术活动。他在百忙中为我开列了书目,指导我点读元史,得暇便讲授一些西北民族语言的勘同与审藏语言字等知识,还专门指导我搜集、整理蒙古色目人碑传。当时元史研究室接受了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史分册、《中国历史

地图集》北方部分等国家任务,使我有机会跟着韩师和诸学长边学习边工作,得到了锻炼的机会。那时研究农民起义是热门课题,于是我选择了元末农民起义作为毕业论文。

1963年研究生毕业后,继续从事上述两项任务,但因下乡、四清等运动而中断。“文革”后期,历史地图编绘任务再次上马,《元朝史》(当时叫《元史纲要》)也开始编写,同样受到运动的干扰,不能正常进行。因此工作效率不高。

10年“文革”终于结束了,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研究的春天。元史研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从封闭中走了出来。“文革”以前我们很少有机会与学界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1978年中国蒙古史学会、1980年中国元史研究会先后成立,为全国同行相互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每次召开学术会议的时候,正是我向前辈学者翦伯健教授、杨志玖教授、刘荣峻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蔡美彪教授、周良霄教授、历史所陆峻岭教授、杨讷教授、陈高华教授、内蒙古大学周清澍教授、林沅教授、杭州大学黄时鉴教授……请教学习的好机会。并有机会结识陈学霖教授、萧启庆教授等海外著名元史专家。元史研究会在学界有很高的声誉,翁老、韩老以他们严谨的学风影响着整个元史学界。翁老、韩老曾分别领导《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史卷、元史卷编纂任务,开创了全国的同行共同合作的新局面。我在参加元史卷的工作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合作与梯队建设的重要性。

韩老、翁老相继去世之后,蔡美彪教授挑起了领导两学会的重担,他以自己崇高的学术地位和领导才能,团结全国同行,不仅使蒙古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的活动继续蓬勃开展,而且完成了多项全国社科规划课题。我在他领导下曾参加了《中国历史大辞典·辽金夏元卷》的工作。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元史研究室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韩师写下“‘四人帮’倒，十年乌云消。……今朝书卷重理，鸡鸣再迎春晓”的诗句。他虽年事已高，在积极参加全国性的各项科研活动的同时，以旺盛的热情完成了多篇论文写作，组织《元朝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卷的编纂，并提议创办《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78年研究生招制度恢复后，韩师和元史研究室培养出刘迎胜、姚大力、高荣盛、萧功秦、王昉等一批学术水平高、充满活力的博士和硕士，他们为元史室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与全国各地培养出来的优秀蒙元史青年学者，构成了新一代学术梯队，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文革”以后的12年间，我主要在元史研究室这个温暖的集体里从事元史研究。除了参与《元朝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卷等集体项目外，还写作了一批论文。这些论文主要围绕着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元末农民起义研究。“文革”前我积累了不少关于元末社会和农民起义的材料，曾发表过关于张士诚、朱元璋等有关研究论文，1964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彭莹玉牺牲时间和地点的文章，投寄给《新建设》杂志，1966年我看到校样后不久，“文革”便开始了，杂志停刊。这篇文章主要根据正德《瑞州府志》的记载提出了至正13年11月彭死于瑞州（今江西高安）说。其实，杨讷教授在编纂《元代农民起义史料汇编》时早就发现了这些史料，并抄送给吴晗先生，吴晗在新版《宋元璋传》中摘录了杨讷抄送的几条史料。“文革”后，我把原来准备在《新建设》刊出的《元末红巾军领袖彭莹玉牺牲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发表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一期上，后来引起国外学者的注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单复礼（Frederick W. Mote）教授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多次提到这篇文章，认为“这种研究在收集有用的资料上还是成功的”。（中译本，第837页）后来我把这篇文章改写为《彭莹玉事迹考略》，发表在《文史》第16辑上，收入本集之中。此外，我进一步研究了元末农民军的铜印、政权、历史作用和各支起义军的情况。这些研

究工作大体上到 80 年代初就告一段落了。二是对元代文化史的研究。在编纂《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史)时我主要分工选编文化部分,《元朝史》我则分工文化、经济、农民起义部分,因而较多地接触了这方面的史料,本集所收有关邓牧、朱思本、王祜、刘基、辽金宋三史和《元史》编纂、贾鲁治河等方面的文章即属于这一类。三是元代政治史方面的文章,数量不多。其中《关于评价成吉思汗的几个问题》是应《光明日报》刘汉屏先生之约撰写的。当时有感于康生、“四人帮”为我们设置的“禁区”太多,连成吉思汗的像也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取走,因此论述了成吉思汗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汗”,并对其功过作了评论。谁知文章刊出后,美联社说这篇文章是“中共对少数民族政策的晴雨表”,后来蒙、苏、匈、东德等国发表了不少评论,在蒙古的反响最大,当时蒙古科学院院长锡林迪布还专门发表文章予以反驳。几家杂志约我写文章回敬,我考虑再三,对方已将讨论的问题引入敏感的政治问题,早已离开我的初衷,纠缠进去会适得其反,因此没有引起更大的争论。四是北方民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本集所收《西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和《古阳道新考》两文主要是从事《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的一点心得。

1988 年我调到银川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工作。在银川工作的五年多里,我要感谢国家民委和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曹仁同志对我科研工作的支持,为我创造了许多条件。银川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是全国研究回族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学术中心之一。我在回族史研究上起步晚,因此我常向李范文、陈育宁、杨怀中、余振贵、丁国勇等教授请教,并得到杨志玖前辈的指导。这几年中,除了应史筠教授之约,撰写《妥崑帖睦尔传》(1991 年出版)之外,全心投入《中国回族大词典》(国家民委项目,1992 年出版)、《中国回族史》(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996 年出版)和《新编中国通史》(国家教委教材,1993—1996 年出版,与南开大学陈振江教授等合

作)、《中国少数民族简史》(国家教委教材,1994年出版,与中南民族学院裕铨教授等合作)的编撰工作,难度和工作量都很大,最后终于完成了,算是向回族同胞和“塞上江南”作一个交待吧。我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还撰写了一批研究回族史和西北民族史的论文,实际上是围绕完成上述任务的副产品。我虽然在1993年调到暨南大学,研究方向逐渐转入岭南文化,但对回族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的兴趣未减,又完成了《回族文化志》(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项目)和《元色目人碑传集》(国家教委古委会项目,与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何兆吉、北京教育学院朱筱新合作)等课题。

人生真易老,不知不觉已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回想起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好像都是在灯下度过的,又好像都是与元史和少数民族史打交道。近20年来,我追随美彪、高华、得芝、杨讷诸公参与中国元史研究会诸多活动,对中国元史研究的开展做了一点事。现在把文章编成集子出版,算是自己对元史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的小结,向朋友们和同行们作一个汇报。

“贺兰”一词出于突厥语,“突厥人谓马为贺兰”,后来蒙古人译为“阿拉善”。贺兰山南北连亘数百里,是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生息繁衍的地区之一。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坐落在贺兰山东侧,每当远眺巍峨贺兰山之景,宛如一匹骏马在奔腾,油然泛起对千百年来西北族史事的追忆。这本集子里所收的文章多为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其中将近半数文章是在贺兰山下完成的。我之所以把这本集子定名为《贺兰集》,是因为“贺兰”这两字既能概括文章的内容;又能表示部分文章的写作地点。

邱树森

1997年3月于暨南园

目 录

序.....	陈高华(1)
序.....	陈得芝(3)
自序.....	(6)

上卷 元史篇

关于评价成吉思汗的几个问题.....	(1)
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的前因后果	(9)
元代各族人民对陕甘宁地区的开发	(23)
元代户口问题刍议	(40)
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	(61)
论妥懽贴睦尔	(87)
邓牧和他的《伯牙琴》.....	(106)
朱思本和他的《舆地图》.....	(120)
刘基和他的《郁离子》.....	(133)
王桢农学思想初探.....	(154)
脱脱和辽金宋三史.....	(170)

关于《元史》修撰的几个问题·····	(190)
--------------------	-------

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	(209)
元末农民政权几方铜印的初步研究·····	(235)
韩山童、刘福通首义颍州考·····	(254)
彭莹玉事迹考略·····	(258)
赵普胜和他领导的江淮起义军·····	(277)
左君弼事迹考略·····	(292)
毛贵事迹考略·····	(299)
元末农民战争和明初的统治政策·····	(306)

下卷 民族史篇

回族族源刍议·····	(325)
蒙古国时期的回回人·····	(354)
赛典赤家族入华时间考·····	(398)
蕃坊、回回哈的司和教坊·····	(415)
元代回回人的商业活动·····	(429)
元代回回研究札记·····	(449)
妈祖信仰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464)
伊本·白图泰眼里的中国穆斯林·····	(476)
《中国回族大词典》前言·····	(491)
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	(507)
古稻田道新考·····	(523)
释“宁夏”·····	(536)

关于评价成吉思汗的几个问题

成吉思汗的活动，不仅关系到蒙古族的历史，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历史。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在评价这个历史人物时从来是意见分歧、毁誉不一的。6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曾开展过关于成吉思汗的讨论，通过讨论，弄清了不少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对评价成吉思汗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成吉思汗是中国古代蒙古政权的汗

蒙古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的祖先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殖的。成吉思汗是蒙古的汗，因而也是中国古代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汗。不能把历史的蒙古当作是外国。要知道，今天的蒙古族大部分仍然居住在中国境内。

蒙古族的祖先是中国境内东胡语系室韦的一支，《旧唐书》称其为“蒙兀室韦”，《旧唐书·室韦传》、13世纪蒙古人自己的著作《蒙古秘史》（即旧译《元朝秘史》）、伊利汗国历史学家拉施特丁的《史集》等史书，说蒙古人的祖先最早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大约在公元七、八世纪时开始西迁，他们渡过呼伦泊，来到鄂嫩河和大肯特山驻牧。从此，他们与居住在漠北高原上的突厥、回纥各部杂处。不论是额尔古纳河还是漠北高原，当时都是唐朝政府管辖的范围。东突厥覆亡后，唐太宗又击败了薛延

陀，漠北各部先后归附唐朝。贞观 20 年（647 年），唐朝特设燕然都护府（后改为瀚海都护府和安北都护府），以管理整个大漠南北，蒙古各部亦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蒙古各部之一的塔塔儿六部中，有一个叫“都督之部”^①，可能就是唐朝任命某室韦都督世袭统治的一部。唐末，阴山鞑靼（蒙古各部之一汪古部的祖先）曾随沙陀首领李克用进入中原镇压农民起义。以后蒙古各部又多次向五代统治者纳贡。

10 世纪初，契丹辽政权建立后，漠北各部都臣服于契丹，蒙古各部亦在其中。辽朝政府在阴山以北置西北路招讨司，管理蒙古和其他部落。蒙古各部向辽政府进贡方物，辽政府则封蒙古各部的首领为“详稳”、“令稳”等官职。

12 世纪初，金朝代辽。蒙古高原属金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使统辖。所以黄震《古今纪要》逸编说：鞑靼“皆事女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说：“方金人盛时，岁时入贡，金人置东北招讨使以统隶之。……〔黑鞑靼〕皆臣属于金，每岁其王自至金界贡场，亲行进奉，金人亦重行答赐，不使人其境也。”黑鞑靼即蒙古部。金朝任命的蒙古各部首领也称令稳、详稳、节度使等。成吉思汗本人和其他蒙古首领都接受过金朝的封职。直到 1210 年成吉思汗才正式与金破裂，中断关系。《元史·太祖纪》载，金主璟死，成吉思汗问金使，新君为谁？金使说是卫王允济，“帝遽南面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遂与金绝”。

由此可见，在 1210 年前，蒙古是我国历代中原王朝的属部，蒙古各部的活动地域，是历代中原王朝的辖地。因此，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政权的汗，也就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汗。成吉思汗与金朝关系破裂固然有反压迫的一面，同时，也有争当中原皇帝的一面。读一读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建国号诏》是很有意思的。他把成吉思汗的事业和他建立的元朝，看作是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继承，所以要“绍百王而纪统”，并称成吉思汗是元朝的“太祖圣武皇帝”^②。成吉思汗时虽还没有建立元